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〇期 ——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2d)

【痛定思痛】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	高伐林
【一家之言】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下)	芦笛
【拒绝遗忘】	徐星在德国放映《我的文革编年史》	王容芬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痛定思痛】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

• 高伐林 •

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夜。武汉市武昌的一处民房。“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枪声，随后是撕心裂肺的哭喊。片刻后，另一处民房，又是一阵枪声、一阵哭喊……

后来这被称为“12·5事件”——1967年12月5日，18岁的武昌实验中学初中学生、刚上任的校革委会委员李乾，策划和指挥一批学生，深夜来到22中两名初中学生孔威、傅强的家中，开枪将他们击毙，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致残，“行刑队”中也有两人中了流弹受伤。

十天之后，李乾等人被拘捕；1976年7月，他被法院判处20年徒刑，同案中二人被判8年、5年徒刑，其他人免于刑事处分。

1985年12月，36岁的李乾因表现好减刑二年出狱。他将自己杀人、坐牢的经历，写成了一部30多万言的书稿《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通过网络传播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在这个事件快40年时，他自费印刷一千册赠送师友。

一个杀人者的心路历程，震撼了许多人的心。而围绕这一事件和他的反思，讨论的声浪也

一波一波升高、扩散。

◇ “文革”高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毛泽东所书。一墙之隔的22中却是一所“最末流的学校”，“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李乾这么说。

1967年12月4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锣鼓喧天，同学们突然发现曾放火烧毁该校办公大楼的22中学生庄洪运混进来，不知要干什么，便将他扣押起来，22中学生闻讯赶来“见人就打”，将庄营救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文艺演出，校门外聚集大批陌生人吵闹着要进来。与李乾同一派组织的22中学生符军等人来报信说：“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22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

情况看来危急。负责安全保卫的革委会委员李乾，和校革委会、学生组织其他负责人紧急商议，越来越多同学也集中起来严阵以待。

直到夜深演出结束，没有出事。有人报告：孔威、傅强等人也离开22中回家了。这边摩拳擦掌备战的同学也松了一口气。正在这时，有人激动提议：“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随后更激烈的主张也一下冒出：“就地打死算了！”

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这些毛头小伙子七嘴八舌地列举22中“流氓”的劣迹，情绪开始升温：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烧了我们办公大楼，打伤高三学生；还绑架支持造反派的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北京南下串联的女生要流氓，抢劫建设银行……“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有同学引用《文汇报》社论说：流氓的挑衅“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这样做符合斗争大方向；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列宁语录：“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眼下公、检、法瘫痪，流氓猖獗，只有我们来管了！

李乾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对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他慷慨激昂地引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青年毛泽东曾发出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英雄气概主导了会场的气氛。有高三学生说“不同意打死”，马上有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决定要干，又讨论选中四个处决对象：“流氓团伙”为首的孔威，“狗头军师”傅强，打手“哼哈二将”庄洪运和丁洪宝。当时很多学生组织都拥有枪支，他们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各组负责人，落实了当晚行动中谁持枪、谁带路。

出发前，李乾心中涌起一阵焦虑不安：处决四人，是否太多？他找到比自己大三岁、政治上更成熟的高三同学何儒非、柳英发。何是新成立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柳是湖北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勤务组中唯一一个中学生，他们同意他减掉庄洪运。

李乾在书中详叙了当晚行刑经过：

孔威所住的楼有前后两个门，李乾下令兵分两路把口，他在前门带队，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敲了半天，孔母披着棉袄终于来开门了。

一个小组成员先朝里开了枪，李乾“赶紧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发着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着他，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只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刚走了几十米，有同学报告孔威还没死。“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他朝孔威一共开了 11 枪。

又去傅强家。傅母开门后，李乾来到傅强床前：“你是傅强？”

几十年后，李乾写道：“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握着那只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

傅强一直没开口。经过不知多少秒钟的犹豫，李乾掏出手枪抵着其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

“‘他们杀了我的儿子！’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惨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多少年了，这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李乾耳边。

本来还应去处决丁洪宝，李乾的脚步却沉重起来，“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终于，他停住脚，下令解散。

◇ “丛林法则”

在世界主调为和平、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今天，在中国民众初步有了法治观念的今天，会觉得这样草菅人命，简直是天方夜谭，对其是非曲直，也会认为一目了然。

然而，这起枪杀案发生在 40 年前的“文革”高潮中。当时的世界大背景是全球烽火：越南战争，印尼屠杀，美国暴力抗争和镇压的枪声不断。而中国“文革”一变为武斗为主，正如一位网友感慨：“那是个疯狂的年代……那时的中学生们，也就是一群疯了娃娃，无论干多疯狂的事，都是‘正常’的。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现象。”

西方社会学研究揭示过群众运动将个人裹挟而去的“政治磁场”效应，法国学者勒庞写过一本有名的《乌合之众》，论述说，构成群体的每个人不管是谁，“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正如李乾书中所写，毛泽东给中国青年套上了造反“红舞鞋”。

在读者作出判断之前，我们要提醒注意，这个事件的若干背景。

——那是整个中国大陆“苍天已死，黄天未立”的时代：党委和政府的旧权威被冲得稀里哗啦，而新秩序尚未建立，公安、司法机关内部也成立对立组织，恶斗经年，社会秩序虽未完全崩溃，但陷于混乱之中。

——就在那年夏天，“红太阳”在视察华中、华南、华北三大区时宣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此前还说过“应该给左派发枪”。一代青年自以为奉了“最高指示”，对于以极刑惩治“危害革命”的社会渣滓责无旁贷；

“7·20”事件后，调来维护社会治安的空降兵部队对武汉情况基本不了解，在“群众专政”思想指导下，要求造反派参与。那时汉阳区民兵联防指挥部设在汉阳公园，由各单位和三中学生组织轮流定期派人值勤。网友“杜良怀”讲述：武汉警司在全市组织了红色民兵连，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安排专门队伍做这项工作——“群众专政”是多么容易滥用武力！

——李乾们还受到先例的误导：1966年“红八月”，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大规模迫害，后来官方披露数据，仅在北京就打死一千多人，无一“革命小将”受到法律惩处，党报还欢呼“好得很”。就在“12·5事件”几个月前，武汉“百万雄师”用冷兵器杀死、杀伤数以千计的造反派民众，也未受追究。李乾书里写道：出事之前有同伴议论：“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简而言之：如果说应该守法，当时却没有法；如果说应该依靠公安机关，当时公安机关却已瘫痪；如果说要尊重权威，当时最权威的“最高指示”，却是要民众自己树立权威！

李乾们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残不如打死”，在那个特定情境下，听来也未必不合“逻辑”：如果不将“流氓”团伙领头者杀死，对方报复一定十倍血腥，自己学校将永无宁日，无法“复课闹革命”。

彼时彼刻，唯一能阻止他们行刑的，只能是“人命关天”古训，但是这个由祖祖辈辈传下的道德律令，正受到导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教诲和红色恐怖中刀光血影的颠覆。李乾和他的同伴真的认为，这就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内战”，自己就是与井冈山、腊子口、孟良崮上的将士一样跟敌人殊死拼杀（网友向旺明指出：如果李乾持枪杀人是发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回忆革命斗争史”，我们会如何看待？）——1966年12月26日，一贯不做寿的毛泽东摆了一次寿宴，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欢聚，他的祝酒辞正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我们无意为李乾当年暴行开脱。只是想说，这样的杀人，远非那么简单。

当然，理解那个疯狂的年代，并非容忍那个年代的疯狂。即使在“文革”非常年代，国人都处在类似环境下，并非都这样人性泯灭啊。率领人以“私刑”处决两个青年，实在是太残忍了。有网友连说“不可理喻”：“是愚昧？是无知？是残暴的互动？是什么使人成为刽子手？！屠杀就是犯罪！”

◇ 铁窗内的反省

“12·5事件”之后十天，李乾和几个同伴锒铛入狱，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刚入狱时，他以为是武汉警备区和公安局军管会误会了，将“为国锄奸”“为民除害”的革命行动当成了犯罪，给家人写信说：“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际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他相信，只要学校的红色政权、造反组织出面说清楚，将被处决的两个家伙的劣迹一一列出，误会很快会冰释，自己会扬眉吐气地走出牢门；

同学确实发起营救，尤其是几位女生，四处奔波，八方求援，写了致省市领导的呼吁信，跑遍武汉具有影响力的单位和群众组织征集签名盖章。李乾后来看到一份“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严正声明”，署名的除武汉地区主要群众组织外，还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驻汉联络站等。

营救没有奏效。慢慢地，在他的意识中，这件事不再是“合法”，但至少“合理”，他转而寄望当局“法外开恩”。再往后，李乾不再认为这是“英雄行为”，却涌上不服气：自己是响应统帅号令的小将，就算带队处决“流氓”做法不妥，怎么就被当成罪犯与牛鬼蛇神关到一起？

李乾书中写道：从1969年开始，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杀人案犯一个个被派待遇较好的“外劳”，被陆续释放；处理造反派则重得多。这让他无论如何想不通：如果“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将“文革”以来“有命案的不分派别统统绑赴刑场，我不会有怨言”。然而，同样杀人，两样对待。

他从狱中见到的各色人等那里受到启示，渐渐反省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谬。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记述，同死神暗中争夺一位执意自杀的“海归教授”，教授被救后对“生命”和“死亡”的诠释，如泣如诉；还有一位一生视政治为险恶、躲过无数次运动的“王老头”，“文革”中运交华盖，但“行动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王老头对政治、对“文革”的剖析，闪烁着睿智的思想火光；李乾对死囚“终极关怀”与零距离观察，在万籁俱寂中，这些即将消亡的生命引起他的沉思冥想。

对生命本身的颖悟，对人生常识的体验，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接纳……我们不知道李乾究竟在哪一个时刻发生“质变”，我们只知道了变化的结果：他成为具有人道精神的“超越者”。今天的李乾说：“写到我最对不起的那三位母亲（他枪杀的两位青年和他自己的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在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

◇ 将个人经历化作公众财富

2005年，他将初步成形的题为“铁窗十八年”的回忆草稿，发给同学和朋友看，发给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学者看。后来他又一章一章地贴上凯迪社区等网站，在更大范围传播，根据各方反馈来修改。2007年9月，他将加上序言、后记和附录后共38万字的书稿，自费印出一千册赠阅。

李乾也惠赐给我一本。开本很大，介乎杂志和一般图书之间，封面基调是深灰，灰到深处，近乎伸手不见五指，那大概象征了夜气如磐和人心深不可测？右下角一个小小的孩子，在向远方的几点星光、一抹曙色走去，孩子的身躯和动作呈现出动感，也呈现不稳定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浑茫暗夜中蹒跚，呼应着最后确定的书名——五个行书大字“迷失与求索”，副标题为：“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反馈很快到来，回帖，来信，有因胡风事件而当了25年“反革命”的老人，也有“文革”后出生的晚辈，经历或关注“文革”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反应曲线不约而同都是“两震”：乍闻

此事，震惊；再读忏悔，震撼。

“含着眼泪读完”（春花秋月）；“感到了每一个字沉甸甸的分量”，“在18年的牢狱生活灵魂的自我拷问”（秋丽）；“止不住的眼泪”（毕锦萍）；“用血和泪写成”（莫安德）；“浸透了人生苦难的回忆文字是李乾留给历史，留给后代的一份厚重的礼物”（谢保安）；“令人震撼而又伤感的文字”（向旺明）；“初生牛犊的虎气跃然纸上”（金水桥畔）；“或许会被西方视作中国《古拉格群岛》也未可知”（老胡）；“究竟多少人是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思想长城的呢？作者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张为）；“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写得最好的一本回忆和反思文革的书”；“有他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没有他这样的境界和才情，有他具有的境界和才情可能没有他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他说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夙愿）；“折射出一度偏离文明发展轨迹的特殊时代”（谢声显）……

网友莫安德说：李乾比遭人陷害的基度山伯爵更加不幸，“向谁去复仇，连复仇的对象都没有，因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是那场浩劫，是那场浩劫的制造者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制度”，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们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无能为力，既无法铲除给善良人们带来浩劫的毒瘤，也无法改变生出这个毒瘤的土壤，“这才是这一代人真正的悲哀所在”！

并非没有批评意见。自称“永远的小人物”、当年红十月宣传队的同学朱丁就感到不足：“书稿中好像很难看到触及一些根本性的、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口口声声‘革命’、‘路线’、‘造反’等等，感觉得到，为当年的风光，你至今仍很陶醉、很自豪”，“有时是否该跳出来一下？从国家到个人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原武汉钢二司常委、也曾坐过三年牢的谢保安也告诫他：“仅仅归结于年轻、幼稚、不成熟，这与你多年的痛苦经历所应该换来的反思似乎还不相称。对于生命的敬畏和认识应体现出与你今天的智慧和人格相对应的高度。”

一位名叫恽仁祥的老人，很不满意他对“文革”的否定：“全书基本内容是揭露文革期间人民监狱的阴暗面”；“跳出个人得失看问题，我想您可能就不会这样写”。根据资料，恽仁祥“文革”中在国防科委一研究所工作，1974年1月给江青写信要批林批孔材料，江青回信，“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并送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各100份。

另一些人，从呼唤人性的角度强烈批评李乾。一位叫袁佳的朋友尖锐地说，“非常反感”李乾的书：“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自恋的成分，而对该事件凶残犯罪的实质缺乏应有的反思”。“难道你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为了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表白你对领袖的忠诚，就可以提着枪一夜之间去杀害无辜的生命？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尽管这其中有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但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犯罪就是犯罪，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另一位网友也斩钉截铁：任何时候，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蔑视生命是最大的恶，珍爱生命是最大的善。如果我们是那两个所谓“小流氓”的亲人，请问你如何评价李乾所遭受的苦难？

◇ “文革”研究者如获至宝

李乾将书赠送给很多“文革”研究者，他们立即作出反应。

“文革”独立研究者陈益南指出：对枪杀二人，须将其放到文革造反运动全过程的大背景之下。“同样是杀人，为什么对战场上的军人，标准是越杀得多越有功，而对正常时候的杀人，

却视为罪不可赦？因为，背景的性质不同。而1967年的武汉，不能认为是正常时期的”，是处在“战时状态”。

陈益南强调：这“不是为杀人做辩护，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展示当年的那种非正常时代”，“不致被人误列为与北京‘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暴行、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屠杀地富的相同性质”。“无论如何，枪杀孔、傅二人，在法理上都是错的，即便孔、傅有该杀之罪，也不能由你们动手，何况还殃及他们的家人。对此，在今天，书中应加深对此的反思、反省。……你在书中说到了对不起三个母亲，但我个人以为，这远不够。”

《东湖风云录》一书作者徐海亮说：“欣慰的是，我的武汉的伙伴、兄弟，又一个用自己的笔，记下了我们一代人永志不忘的历史。”他“读了法国大革命历史和19世纪的法国小说。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出中国的巴尔扎克，写下中国的人间悲喜剧……你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时代沧桑。何况，历史本身已被扭曲、玷污、颠倒”？

著有《文革反思》的白磊说，阅读本书，想起了另外两个作者“文革”坐牢的纪实著作：湖南“省无联”杨曦光（即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文革中囚禁的精灵》，和鲁礼安《仰天长啸》。“您的这份记录弥足珍贵，且有对历史的自觉反思”。

白磊还将历史与今天联系起来说：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常识、缺少宽容、缺少反思，这种缺失，“最终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暴力、仇恨、自大和非理性。当下社会动辄连杀几人的案件，不正是这种精神缺陷的反应吗”？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连连称赞：“真是太好了”，“经历了艰苦的思考，完成了这样的纪录，这是历史的纪录”，“这是非凡的创造，创造了精神财富，尽管代价太高。你用生命书写了本书的前半段，你用书本维护了最重要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我对此无上敬佩”。后来，她回武汉策划拍摄关于“文革”人物的纪录片，李乾的故事，也成为其中主要段落之一。

想拍纪录片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她说：“您书中描写的情景，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对这一类事情已经拥有的认识，虽然您本人却始终是那样心地单纯、目光清澈，这是后来的人们难以理解的。”她很想拍摄这个故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也许是跨越一年时间的了解、调查和跟踪拍摄”。得知艾晓明已经拍摄才作罢。

学者何蜀承认：“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说不定也会有同样的不理智的行动（只是可能程度或方式不同而已）。”“许多年轻人当年都是那样满腔热忱而又莫名其妙地就在本应该好好读书学习的时候走上了悲剧性的道路。然而时至今日，真正的罪魁却还未能得到认真的清算”。

著名学者和作家们，像徐友渔、高华、胡发云、徐海亮等人，都热心地向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推荐此书。在上海学者萧功秦推荐下，本书由美国的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

李乾带动许多人反思“文革”，不少人读后都下笔不能自抑。李乾书中说：“越是重点中学，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独立研究者钟逸指出，这概括了全国“文革”红卫兵学生运动的普遍规律，像湖北的大、中学生的造反派领袖全出在著名院校和省市重点中学。

《所谓草民》一书作者、重庆作家谢声显，写下评论《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李乾在反思中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已升华到真正的悲悯和圆融。时代纵然可以随意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它却无法抹去哪怕一个犯下杀人罪的青年即使在黑牢中所显现出的生命

的光彩”。他相信,“《迷失与求索》及其许多细节都会进入社会历史学家的视野”。

一位网名“老胡”的友人的洋洋数千言,则可称一篇关于“平等”的论文。他全面梳理了这一理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功能,社会不同阶层关于平等的诉求,从这一视角来理解“文革”中的大开大阖,暴起暴落。他认为:“造反派之所以参加造反,其表面原因当然是响应号召或是受到中央文革的蛊惑,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追求‘平等’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重视“人格、人权上的平等”,“无疑是共产党所不喜欢的”。

老胡分析,毛泽东有着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也有“平等情结”,但他“只许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绝不许别人这样”,“希望他的子民之间有平等的权利,但他绝不与他的同志们‘平等’,更不能让知识分子与他平起平坐”,实际上他有很强的帝王思想,实行个人独裁。所以,他连连出手瓦解造反派队伍。而邓小平一面对知识分子平反安抚,一面把“造反派”定成铁案,把“文革”中坏事都推到“造反派”头上,“造反派”变成魔鬼的代名词。

老胡感叹:什么时候,谁能还“造反派”一个历史的真面目?

◇ 不再是只有控诉没有忏悔

多年来,谈到“文革”暴行,人们听到的都是控诉,很少听到忏悔。有人质问:人人都自称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呢?网友“idol1980”说:经常听人在评价日本人时说不反省的民族没有前途,我们自己反省过了吗?谁为“文革”道歉?谁为“文革”下跪?

普遍的选择性记忆,使人们不能将对“文革”的反省深入下去。今天,人们却看到了敢于忏悔在“文革”中犯下杀人罪行的李乾。李乾所阐述的看法,人们可能见仁见智;但他的忏悔精神,却使他赢得近乎众口一词的敬佩。

网友秋丽认为:无论从什么历史背景、大环境为李乾当年的行为作解释都是苍白的,都不是剥夺人命的理由,“杀人,是不能被饶恕的”,但我“看到了李乾的痛悔,看到了李乾的向善”,“他原本就不该是刽子手”,李乾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江说:李乾书稿“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作者扛起巨大苦难的刚强——他是做错了事情,他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没有趴下,他在反思,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网友向旺明说:“文革死过那么多无辜者,真正能反思的加害者,仅李乾一人”。另一位读者说:他受到震撼,李乾“敢于把活生生的自己放在解剖台上,用犀利的文字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用至诚的语言忏悔和反省”。

网友家良写了一篇短文,说李乾当然有罪,但“法律已对他作出了裁决,他用了青春的代价去赎罪”,李乾在灾难性打击中没有倒下,几十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理,“这在同时代人当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时至今日,又有几个负有直接责任者站了出来,能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复原在公众面前”,让人们去评说?

他将这篇短文题为“李乾是条汉子”,一语既出,众表赞同:“是个硬汉,更是个强者”,“一个让人敬佩的热血男儿。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这部悲剧的整个过程中折射出了个人坚毅、执着的人格魅力”。

引人瞩目的是，围绕李乾书稿，形成了一个反省的群体，其中有李乾的高中同学何儒非，还有一位原武汉三中学生造反组织骨干，后来被当成“三种人”坐过几年牢的谢保安。谢保安在网上几次长篇发言，认为：作为文革参与者，作为当时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很有必要对自己、对那段历史作出深刻反思，而不是仅仅把自己作为那个时代的被动受害者，因为被裹挟，被误导，而一味地去为自己解脱。他认为，李乾为研究“文革”教训提供了最直接的案例，这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谢保安披露，事件发生前的一些流行提法，如“武装左派”和“建立第二武装”，直接导致抢枪和武斗事件，导致对无辜生命的漠视和屠杀；对“群众专政”的怂恿更助长了群众组织中无视法制、无视生命的暴力倾向。

这些口号并非如后来在清算造反派时所说是“无政府主义产物”，恰恰相反，这些设想正是出自“伟大领袖”，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东湖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就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夸奖了在水电学院修建的武装工事，一再要去参观。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当时的造反派都头脑发热，加上地方要员投毛所好，主动向造反派献媚。据称当时15军主动向钢二司提出“武装左派”，帮助安排钢二司从军械仓库“抢枪”。造反派在那种热昏状态下做出许多荒谬决断，李乾杀人正是其中之一。

李乾同意谢保安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反思不能要求先决条件。“无论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是否得到公正的说法，我们都应该反思自己当年错误的行为及思维”。当然，反思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历史。

“文革”中武汉死于非命者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最保守也是以十万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为数多少？难道不该呼唤更多的当事人站出来，对受害者深深鞠一躬？

◇ 罪人后面的罪人

李乾所描绘的“文革”场景，带动了很多回忆“文革”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惨剧，人们生活在“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革命是暴力”的氛围之中，这些学说将人心中最丑恶，残忍的兽性，充分激发出来。有一位网友说，“1968年6月初我们（湖南）邵阳市的资江河里漂来了大量被虐杀的尸体，其状之惨，至今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另一位署名为“xsx_1029”的网友说，他所在的四川万县地区“文革”武斗时死了3千多人，其中杀俘2千多。他介绍：定为“派性杀人”，多在学习班关一阵了事，若定为“武斗杀人”更轻。如果情节特别恶劣，也是一条命判3年左右。

网友“金水桥畔”沉痛地问：在他们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担起了承受不了的重担，最后竟被这一神圣的重担压垮，走向了黑黝黝的牢狱——“谁之罪？”

网友邹芳本说：中央决议说“文革”发动和领导者动机是好的，是“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篡党夺权”！比他老人家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

另一位网友引用元曲小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人要想坐稳自己的位子”不要祸及无辜的百姓，别把百姓当炮灰。

网友“悠然心会”在题为《“文革”终结者》的文章中说：“那是一段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

历史”，产生浩劫的罪恶和浩劫产生的罪恶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毫不过分。如何让浩劫真正不再重复？如何让漠视人类基本诉求的“（中国）特色”永远消失？他认为，要找到并消除造成浩劫和“特色”的原因。导致“文革”产生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变化，谁能够保证没有下一次“文革”？只有使这些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的名义”草菅人命才可以成为历史。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李乾这部书引发的思索，也是多种向度的。网友“夙愿”就从中看到“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生与死的较量”。

“夙愿”这样归纳李乾笔下的“文革”：晚年毛泽东在作为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向该体制阴暗面宣战——但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下层民众应声而起，是因为毛这一宣战契合了他们的民主诉求。而这宣战一定会被毛自己取消。只不过毛“取消”得太快，一两年光景，这批响应者就被列为“文革”的整肃对象，连他们在“文革”前曾经拥有的东西都被剥夺。但既然已被唤起，不论下场多么悲惨，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把民主、自由作为自己终生追求。不管他们是否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他们早已走出毛泽东的“文革”。

“夙愿”说：李乾走到这里似乎差不多到位了，其实还远没有：“走出了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从思想上走出了历史的怪圈么？”

◇ 负罪感一生都无法卸脱

李乾的反思和忏悔并没有中止在牢门。他写书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砥砺自己，修正和升华的过程。而在传播中也不断在修改。很多重要的感悟，就是萌生于传播中的心灵碰撞。何儒非、柳英发这几个当年的战友，将李乾通过这本书进行反思也看成自己的使命，该书脱稿之际，他们几人联合发起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一次庆祝仪式。这次聚会，开成了一个“文革”反思会，与会者以认真和诚恳的态度，对事件受害者表示追悼和忏悔。

何儒非的发言《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才可能真正地看清历史》，很有代表性。他说：“血案发生以后，我们这几个对血案负有直接罪责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既有法律上的，也有行政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灵魂上的。事实上，当这一事件血腥的、残忍的恶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与恐惧之中”，自那一刻起，直到今天，“灵魂一刻也没有真正平静过”“使我们一生都不得不在无法卸脱的负罪感中度过”。

他说，“12·5事件”不仅因为它的血腥震撼了许多人，也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困扰了许多人。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乎常理的“作案动机”。就是我们自己，多年来也在苦苦思索，写了无数页“自我检查”，挖了无数次“思想根源”，这一答案始终没有真正找到。最后能归结的，只有一句话：“受错误思潮影响”，“错误思潮”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

由于没找到答案，使得法院写了一份罕见的、一字不提作案动机的判决书。因为办案人员的调查只能一再证明，案犯都是充满革命理想，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作案目的和动机只有一个：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文革”！何儒非说，“事实上，当年的办案人员已经走到了真相的边缘。如果不是一层难以穿透的政治雾障，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分裂人民、鼓吹暴力的所谓‘革命理论’‘革命学说’一步步地，把这些年轻人引上了邪恶之路！”

◇ 不仅要跪下忏悔，更要站直思考

写这样一本书，对于李乾来讲等于重新受了一场非人的心灵折磨。

他在这个仪式上，发言题目是“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李乾认为：如果说“文革”中我们某些举动是灵魂第一个痛点，那么置身其中的人不能留下一点认真的反思，会是第二个痛点，必须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反思“文革”，否则也许根本看不清“文革”本身。反思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忏悔。这忏悔是几个在“文革”中铸下大错，但已走出“文革”的人对那些受害者的忏悔。忏悔是生命对生命的尊重，是人对人的理解。“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想发出一点声音，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多一点宽容理解，少一点仇恨偏执”。

李乾的反思，不仅针对“文革”，而且追溯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他说，宽容本应是人人都有秉性，不幸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最缺少的元素。“五四”给我们留下的负面“遗产”之一，就是只要认定自己革命，那么，异己的思想要么投降要么灭亡。“主观上是想开启‘科学与民主’的新风，实际上却是延续了‘愚昧与独裁’旧例”。言论不宽容发展下去，就逻辑地变成1925年国共联手焚烧讨论对俄问题的晨报报社的一把火，逻辑地变成刀、变成枪、变成置异己于死地的“清党”，把对方视为匪、杀无赦，对自己内部异己同样砍起头来不手软，“再后来就有了胜利者把‘镇反’中杀头的数量定为全国人口的0.5~1%”。

李乾认为，这个不讲宽容，认定非友即仇的遗产导演了中国的百年历史，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驱导我们在任何领域内都走上“斗争哲学”的不归路，一走就是一百年。文革是这个遗产的又一个注脚，“12·5”事件是其中一个小标点。

与别的忏悔者或许有所不同，李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12·5”事件主要责任人，不仅仅要跪下来忏悔，更重要是要站起来思考。他在2005年9月8日致何儒非的信中比较了东方与西方的反省：《罪与罚》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反映；而美国霍桑《红字》却让耻辱标志有了全新含义，表现的是超越和升华：犯了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之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新人”，“这才是更合乎人性”。

他认为，当时有些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写的时候想稀里糊涂也不行了”。其结果，就是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罩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 革命与犯罪·精英与法西斯

北京历史学者陈小雅读到这本书后，情不自禁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在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时，应李乾要求，陈小雅将之作为书的序言，题为《革命与犯罪》。

陈小雅指出：在青年毛泽东时代，许多人是因为犯了“罪”才投身革命，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却是为“革命”才去“犯罪”的。

她一一指出了作者沉痛反思、难能可贵的思想结晶：革命的权利并不等于杀人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以“文革”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毛泽东在利用青年的热情无知，去进行冒险的“社会实验”时，并没有为他们上“保险”；而导师关于为革命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人的生命的“教导”，

则无可回避地充当了“教唆犯”……等等。

陈小雅以其敏锐，从以身在精英学校为荣，看出李乾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把邻校一帮曾有等不法行为的青年视为“流氓”。

徐海亮也感觉到了，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你和他们（被枪杀者）双方的悲剧，里面有何更深的内在冲突？柳英发有强烈出身反差感的问题，是否在两个学校两派冲突里有深层的驱动作用？这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

李乾在给何儒非的信中，看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但他的口气中带有自我辩解：

为什么“12·5”事件会发生在最负盛名的实验中学？这个问题恐怕困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我回答一个人的提问时说的一句话：“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这里的“比邻而居”四个字是关键。……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革这个没有了任何束缚的环境，发生剧烈的对撞是不是一种必然？……区别在于如果不是他们先打过来，我们决不会主动去找他们的事，而他们则是把暴力当作目的本身。区别还在于我们草菅他们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会受到极大的震撼，会有深刻的反思和对自身的超越。他们则几乎不可能。……

陈小雅犀利地解剖了“精英意识”：面对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悬殊，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主宰，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犯罪主人公认为，应该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人”主宰；而杀人，则是“一劳永逸”的改造方式。“世界上有很多伟人都是刽子手……他是因为要推动历史所以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你要作为伟人的话，你不能在乎杀个人，这是无所谓的。”

革命是暴动，暴力是革命的“接生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一场革命的成功，为下一代竖起榜样；在他领导的第二场革命中，又故伎重演。现已揭露，不是别人，正是他老人家关于“天下大乱”、“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的思想，直接倡导和推动了“文革”的血腥武斗。在武汉事件上，他甚至是第一推手。

陈小雅剖析说，“精英意识”是一把利害相交的双刃剑。精英的确有比普通人易于走近犯罪的“优势”，那就是他们自以为身份高于常人，就可以安排别人的命运，高估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其次，他们自以为出以公心，或者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着，因此从品质上优于一般人，并对普通人怀有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将一切世俗的计算、胆怯和自私的犹豫视为落后，从使自己蔑视常识，脱离常轨，以至于泯灭常情；第三，他们认定一切远大的考虑，均不是老百姓所能领会，却又是必须以牺牲普通人眼前利益为代价的，所以一般地较容易采取“愚民政策”。

不仅如此。陈小雅更接着分析：李乾对审案人员骂他“法西斯”非常反感。但如果不存成见地看，就个体而言，法西斯分子和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很多可能就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具有高度的团队精神，随时准备自我牺牲……但一旦被组织到一个邪恶事业中去，“流氓”的能量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陈小雅注意到李乾在陈述犯案过程中，强调了民主讨论的程序，她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授权”。因为民主授权所给予的权力，一定是有行使范围和外部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授权人群范围之内的事务”（譬如学校内部保卫事务）。在法治时代与法治社会，这并未使受权者的

权力产生相应的无限延伸。

陈引申开来：阶级的战争也是如此。本来，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可能都有值得批判或惩处的分子和劣行，但如果变为对于一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群体性惩处与剥夺，就混淆了善与恶的界限，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最终那颗难咽的果实，需要用不停顿的阶级斗争来消化，用不松懈的专政手段来保卫，以至于把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据李乾介绍：两名死者的家人都已不在世了，事发现场早已另建高楼，想向周围一步之遥的老居民打听此事，竟无人知晓。

幸亏有李乾这样的忏悔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见证。

（2008年2月完稿。）

~~~~~

### 【一家之言】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下）

• 芦 笛 •

简言之，革命的通用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那“我”通常是革命领袖一人或顶多是一个领袖小集团。

任何长了脑袋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套恰和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石的民主制度针锋相对。因此，世上最大的智力笑话，乃是把“民主”和“暴力革命”这水火不相容的玩意搀和在一起。只有惊天动地的白痴，才会以为通过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民主社会来。正因为此，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对此道有兴趣，凡是投身革命的一定是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那种浅薄知识青年。

这就是中国为何会出现“越革命越黑暗”的历史悲剧，那乃是因为咱们是白痴之邦，看见辛亥革命还不够，还要搞国民革命，搞了国民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毛共“民主革命”，搞了毛共“民主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文化大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新时代的民主革命……每次浅薄的知青革命领袖们都决不会悟出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却认定那只是以前的革命 somehow and somewhere 出了错，而自己发动的新革命则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一定只会是“结束一切革命的最后一次革命”。

还不止此。要强暴革命者、反革命、中立者等等所有人的自由意愿，无非是两条，一曰杀人立威，二曰造神，让大众要么因恐惧服从，要么因狂热崇拜服从，斯大林、毛泽东靠的就是这两手。民运江河日下，就是因为缺乏这两手，而法轮功蒸蒸日上，则是因为有第二手。

但这种烂事搞多了，必然使革命领袖变成斯毛那样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造神运动必然毒化革命领袖，使得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真神，因此给全国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因此，悖论在于：“往日穷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顶天立地的人”则是最可怕的。

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是把穷人“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而不是让他们“翻”起来，爬到众人头上去作主人。

历史上能成功解决这问题的途径无非是两种：“民主恩赐”，通过贤明君主被动或主动的让步，逐渐消除社会不公，具体事例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举过了。另一种则是革命者能见好就收，及时退让，英国“光荣革命”就是最辉煌的例子：革命者取得优势后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把保皇党人斩尽杀绝，独霸天下，而是及时适可而止，从外国迎回个空头新国王来。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存共荣，靠文斗来轮流执政，实现了分割社会财富的动态公平。

可惜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政治想象力，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在占了上风时都丝毫不知克制自己，一定要把事情作绝。统治者在台上时从来是贪得无厌，见了棺材都不掉泪，大饼之侧决不容人垂涎；而人民占了上风时就一定会使足顺风船，一定要斩草除根、犁庭扫穴，于是中国便永远只能在“黑暗—革命—更黑暗—再革命—更更黑暗”的怪圈中打滚，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在近现代史上，咱们错失良机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中，我指出，辛亥革命本来已经吓得清庭同意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袁世凯的内阁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权内阁，“虚君共和”的目的已经达到，龟孙中山的折腾却断送了中国变成第二个英国的可能。

抗战胜利后，中国又一次面临这种实现民主的机会。美国人出的“联合政府”其实是个毫不可行的馊主意。像国共那样针锋相对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的，只能轮流执政或分别执政。当时可行的方略乃是成立联邦或邦联政府，由国府治理国统区，由共党治理“解放区”，两家和平竞争，在敌意逐渐淡化之后再考虑合并两区，以竞选实行轮流执政。如果不能达到联合目的，那也没关系，和平竞赛好了，向全国人民提供选择居住地域的自由，最后以繁荣自由的生活方式将“解放区”的人民统统吸引到国统区去，掏空共党统治，迫使他们改变治国方式，逐渐演变为民主国家能接受的开明政党。

就连在文革那最黑暗的岁月中，准民主也曾闪现过一线曙光。那就是我说过的，当全国分裂成两大派后，在武斗爆发之前，如果毛有点起码的文明常识，完全可以仿效西方，将两大派群众组织改建为议会政党，靠竞选进入各地革委会，轮流执政。但无论是领袖还是人民都毫无这种观念，不知道对立两面无法组成能工作的联合政府，但可以轮流执政。于是毛便徒劳无益地指望两派联合起来，而信奉“斗争哲学”的群众根本就没有联合愿望，最后只能以大打出手告终。

可叹的是，前朝遗老们根本没有起码神智明白上面说的最简单的道理，至今还在为他们的革命失败而扼腕不止，发誓要完成那“流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怎么就不想想：幸亏他们的革命没有胜利，否则中央造反派掌握了全权，中国还能有今天的光明模样么？难道林彪、江青等同志会在毛死后彻底背叛毛的革命路线，毅然放弃反帝反修的神圣原则，拱手请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实行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面彻底深入的经济侵略？

最可笑的还是，我说出实话来以前，似乎这世上就没谁明白四五运动的实质，为了照顾司令等同志，我把写在自传《黑崽子》里的那段话翻译在这儿吧：

“关于‘四五运动’的消息使我极度震惊，这还是当局第一次在首都心脏公开镇压了一场

群众运动。尽管官方新闻报道有意淡化了事件规模，我仍然立即就从发生在本市的事件中猜出了它的浩大规模。新闻报道同时也披露了一些贴在广场上的大字报的话语，表明那是一场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批邓运动的自发群众示威。群众花了十年才完成了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180度的大转弯。十年前，他们响应毛的号召，起来推翻了刘邓。现在他们却发现革命扶植上去的那些激进派远比被推翻的老干部糟得多。群众现在想恢复被他们砸烂的旧秩序。通过他的文化大革命，毛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代表旧秩序的周和邓变成了人民英雄。”

这难道不是昭如日月的事？难道我不说出大家就永远看不出来，说出来后还无法理解？当真是不可思议！

再重复一遍，四五运动是人民公开否定以四人帮为代表、以毛为后台的中央造反派，公开肯定以周和邓代表的中央保守派，是人民公开对文革说不，尽管说得太晚了些，但仍然是正确的。

请注意，我认为这运动正确，倒不是因为它是人民心愿的自发流露，而是因为那是反革命。人民不过是在吃足了苦头后终于认识到革命没什么好玩罢了。这并不能证明人民永远正确，民意永远值得尊重。早就说过了，人民不过是一堆肌肉而已，决不是诸位拜民教徒那神智不清的脊髓或肾上腺里想象的那个上帝。

经过文革的人，应该都明白“人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人民图腾》中写下来的简单道理，其实是我在70年代初和密友一道悟出来的东西。后来到了西方，看了托克维尔、Walter Lippman 和 Edward Bernays 的书，一点都不觉得稀罕——他们说的那些，我早就在文革中再痛切不过地感受过并自己总结出来了。

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两点：一是原来暴民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二是这些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暴民运动，其理论总结能力竟然赛过绝大多数有着丰富感性经验的亲历者，不能不让人叹服人家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正如《动物农场》作者奥威尔本人丝毫没有在共党国家的生活经验，其对共党制度的批判的深邃准确却让我这亲历者无数次拍案叫绝一般。

令我无限震惊的是，连我这种比较迟钝的同志，在国人中竟然也能算是先知先觉。上网后，我无任懊丧地发现，许多人同样经历过文革，甚至还受过严重迫害，可居然也就丝毫不开窍，反倒走火入魔，越发堕落为死不改悔的拜民教徒。我发动“扫荡伪民运”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为这些同志疗愚，为此特地在四年前写了《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向大众推荐Lippman 和 Bernays。那阵子我的内耳出了问题，成天头晕目眩，昏昏如醉，把Lippman误记成了Litman，当即便有网友来信问我是不是Lipmman，让我不胜惭愧。

这里我再次向同志们推荐去看看那两位同志和托克维尔的著作，起码要看看托克维尔对暴民统治的准确描述（似乎是在《法国大革命史》中，但不敢保证）以及Lippman 的Public Opinion 和 The Phantom Public 那两本名著，则庶几可知公众和公众观点是怎么回事。我本来讨厌文科绣花枕头引经据典吓唬外行那套，但既然本人人微言轻，只好请出洋权威来助阵了。

可惜，洋权威们不知道由毛共党文化炮制出来的中国读者的特殊问题，所以这疗愚的责任还是只有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这里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对“人民”这个中国人最拎不清的概念的认识吧。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国的“人民”的概念有个最本质的区别，然而没几个人意识到这点。

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具体的、清晰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人民”，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则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实体，每个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而在东方，“人民”乃是类似“法轮”、“气功场”那样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神物，无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观念，而东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观念。

正因为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凡夫俗子的总和，所以，谁都是人民，决无被开除出人民队伍之虞，但谁也不能冒充“人民领袖”，哪怕是国家元首也不敢说这种话。而中国的“人民”则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它并不具体化为一个个的人，只能附身在某个大祭司（亦即所谓“人民领袖”）身上作法。

这基本观念的区别，导致了东西方对“人民国家”理解的巨大区别。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万别，所以既不可能由一个人民领袖来代表，也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只能以妥协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阶级、集团各自选出自己在某个特殊时段内的临时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众事务的决定。在无关公众的领域里，则每个人都是人民，谁也无权管他的闲事。而在东方，人民乃是一个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一人来代表。这就是“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出笼的文化背景。

这也就是伟大领袖为何要发动文革：他在执政后，才朦胧地发现由共产党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相当大的差距。“民主革命”做到的，不过是制造出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和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来，和他那“人民当家作主”的朦胧幻境并不是一回事。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让他看到“人民可以由一个政党或甚至一个人代表”是彻底错误的命题。相反，他执着地认定自己是人民领袖，问题只出在干部队伍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上。为此，他作了大规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验，也就是由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

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乃是“直接民主”，其必然结果就是比暴君统治还可怕的暴民统治，后者之恐怖，托克维尔早就在《法国大革命史》中无比生动地描写过了。如果伟大领袖看过那本书，则他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而中国人民也就能逃过那空前浩劫了。Alas，该同志和许多民运人士以及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粟先生一样，平生没有看过一本马列之外的外国思想家的著作。

伟大领袖不明白以下常识：

1、人类社会只能采用精英来管理，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民主和独裁政体在这上头并无差别。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由谁来任命这些精英。

2、因此，“民主”决不可能是“人民当家作主”，永远只能是精英当家作主的“间接民主”（亦即所谓代议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决定国事的“直接民主”。无庸讳言，以间接方式代表民意必然有相当大的系统失真度，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系统，顶多只能在关键问题上以全民公投来作为校正措施。

3、无论是全民公投，还是议员代表人民决定国事，都只能在严格的程序框架内进行，人民必须受程序严格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程序。



4、如果不顾这基本规律，试图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则不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实际运作困难，而且必然要导致比暴君统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专制，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动的例证。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 Lipman 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1 + 1 + 1 + 1 + \cdots = \text{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89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是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即使没亲历文革也没关系，只要见识过严新大师“带功讲课”也就够了。那就是最典型的

群体催眠。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89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89学运期间小偷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

我党的邪恶恰在于既信奉仇恨教，又讲究“群众路线”，每次搞运动，必然要以煽动仇恨作为发动群众的唯一手段，这就只能制造出可怕的暴民统治来。从土改直到四清无一次运动是例外，并不仅文革如此。文革的特殊处在于，党的震慑约束力根本就没有了。伟大领袖直接发动暴民起来造反，于是便将全中国变成了个由毫无制约的仇恨支配的巨大的群体催眠场，由此引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暴民恐怖统治，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列举的那些酷刑，全是我本人耳闻目睹的：

“点燃捆在阴茎上或插在阴道里的鞭炮、将赤裸的躯体按在撒满图钉的地板上、光著膝盖跪在碎玻璃上、小腿上压上钢锭、脖子上用细钢丝挂上沉重的铁牌、将受害人吊在龙门吊上‘经风雨、见世面’、扔进粪坑‘遗臭万年’、将炸药包放在捆在一起的地主分子夫妇之间，勒令他们的亲生儿子去点燃引线……”

除此之外还流行过什么“群众专政”、“群众破案”等等花样繁多的名堂，甚至在革委会成立后还这么做，据说是彻底破除旧公检法的“专家路线”。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我回忆了当年市革委把“罪犯”名单发给大众，由群众决定量刑，据说这是根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说的“谁个劣，谁个不劣，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罚不当罪的极少”，也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结果同志们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一致振臂高呼：“枪毙！”

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来的，并不是共干或是伟大领袖干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民，并不是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个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上帝。而毛泽东的罪恶，恰恰在于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果他不以人民的解放者和导师自居，不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只是一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昏君，只知自己穷奢极欲，不立下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救世大愿心，则人民也就不会遭受史无前例的糟害。他的“人民民主”导致的唯一结果，便是放手让人民自相残杀、自相虐待、自相迫害。这种真诚的人民解放者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难道可以如余大郎那样，用“良好动机”作为辩护借口，来“一分为三”？！

最令人气短的是，在毛式拜民教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如此惨痛深重的灾难之后，那伙前朝遗老竟然至今还在迷恋这套。余大郎转贴来的老郑那份《趁机造反》帖，让我看了直打寒战。同样是黑崽子，同样都出了国，他现在的政治觉悟怎么还不如70年代的我？

如果读者明白了上文讲述的简单道理，则不难看出文革和中共“民主革命”的共同点来：两者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民革命，都有极广泛的草根参与，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旧统治者，都具有强大的道义优势和精神感召力，而吊诡的是，这些特点恰恰是它们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所在。

说这两次大革命都是反动的，乃是指它们逆人类文明进化的大趋势（亦即西方文明的进化趋势，请注意，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会进化）而动，引起大幅度社会倒退，造成了文明的空前毁灭。说它们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说它们不但在当时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强大道德感召力，永不缺乏传人，永远要感召激励着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去继承革命先烈未尽之遗志。于是一旦社会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新一代革命家们就一定要以这两次大革命为效法榜样，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类似的大革命再度肆虐中国那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天然革命温床。因此，这危害性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用理工干面包们引以为傲的“数学比喻”来说，它的危害性覆盖了从1921年开始，直到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整个时间坐标轴。

唯其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罪人。论对子民的敲骨吸髓，秦始皇大概超过了他老人家吧，可老赢的危害性也就只限于秦朝那短短的一瞬，秦亡政息，并没有留下个永恒的道德榜样来让后人追随。论“相对杀人量”（亦即以绝对杀人数除以（掌握的军队数量×控制的地区人口×屠杀的时段），伟大领袖恐怕也比不了黄巢或张献忠，但那些杀人魔王都是“人死病断根”，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什么光辉的革命理论继续作孽。在死后还能继续危害国家民族的罪人，中国历史上也就仅此一人而已。

伟大领袖自己也知道这点，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他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在《张玉凤证言可信么》一文中，我说：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这段话一直如噩梦般在我心头缠绕，驱之不去，完全成了一种obsession。我相信伟大领袖的洞察力，深知他说的是实话，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教导是时光无法抹去的，起码一个世纪内是如此。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这噩梦不要成真。”

这话却引起了王司令的激赏，记得他跟贴赞道：所以我说就凭这一点，毛也不能全盘否定。余大郎的“一分为三”论似乎也有点这意思，只是他现在矢口抵赖，本特首原意是疗愚救人，不是要和谁过不去，愚愈之后当然不便再深究。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粟先生以及刻意在遣词造句上模仿鲁老恶毒夫那半生不熟的白话文、却不幸丝毫未得其神髓的CAOGEN同志则公开“深切怀念毛泽东”。我觉得这些同志倒还光棍得多，起码比老郑同志要幸福多了——我那阶级哥哥分明是毛的嫡传弟子，却在感情上恨透了恩师，如此做人，岂不尴尬得紧？

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糊涂虫，我才如此执着地“反毛”，才如此执着地批判党文化和文革。

在我看来，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什么鸟意思都没有。老毛早就烂了臭了，你再骂他，他

好像也不会难受不是？现在国内学者争论吴三桂和施琅是好是坏，这些P事到底和现代人有什么贵相干哪？就算他们真是卖国贼，人家又没留下《吴选》和《施选》来，教导后人卖国是何等义薄云天的壮举。以后谁想卖国，也只会出于个人动机，决不会是受那些人的道德榜样感召，情难自己，奋起效法，是不是？哪怕再蠢的白痴也该能想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吧？

这就是毛的可怕处：哪怕在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中，毛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都有极大的蛊惑力，如果不指出它们的危害，势必要在社会危机如此深重的中国再度引出类似的巨大灾难来。

这就是我为何要“反毛”，我反的不是毛这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他的思维方式集中代表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愚昧。我认为，研究历史，重要的不是给死人戴“好人”、“坏人”的帽子，重要的是在客观澄清了史实之后指出得失，总结出前人错在哪里，让未来一代庶几能避免重蹈覆辙，特别要注意指出自宋明理学昌行以来，多次在历史上发生的那种“由正义感引发的灾难”的恶果，因为它对后人特别有蛊惑力，那危害性不但是过去时，还可能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不幸的是，似乎至今没有哪个史学家认识到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他们不是“古为今用”，使用文革制造冤案的方式去古书里刨找黑材料，加以随心所欲的改造加工，用它们去论证或诋毁现行政策，就是热衷于给古人戴好坏帽子，却全然不懂研究历史的全部现实意义就在“惩前毖后”四个字上，而光是戴道德帽子、“否定”、“肯定”死人是绝对无法起到这种作用的。

这就是为何“大跃进”和文革同为毛的两大罪行，犯罪形式也类似——都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而且若论害死人数，前者还要远远超过后者，但我基本没批判过大跃进。那原因再简单不过：是人都能看出毛发动大跃进时采用的白痴思维方式，他那种治国白痴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基本可以排除在未来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但文革则完全不同，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我一人认识到文革是“正义祸国”的最典型例子。评价者或看到“正义”那一面而加以肯定，或看到“祸国”那面而加以否定，却没有足够的思维能力看出两者的因果关系。

可惜海内外华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位如此反毛者，最常见的反毛志士还是民朋那干人，他们从感情上恨透了毛，但至死悟不出自己为何会遭受了如许灾难，至死悟不出毛究竟错在哪里，只能把毛的罪行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认定他是天生的魔鬼。因此，他们一面对毛深恶痛绝，一面又将毛主席的教导溶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髓中，落实在行动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打着红旗反领袖”的“反毛的毛主义者”。甚至当我出来抨击这种作法时，他们还抵死悟不出来：我并不是反对他们，而是反对在他们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最高最活的毛思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现状竟然会出现，本身就是终身知青们洗不去的耻辱！

为了对这些终身知青进行再教育，我这里用 idiot-proof 的提纲总结一下前文的意思：

1、伟大领袖自己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国府，二是发动文革。上面已经说了，这两件事在道义上都无可指责，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奋起推翻统治者，都以工农大众作主力，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革命。但这并不能构成肯定两者的根据，相反，它们之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并在未来可能再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恰是出于这道义上的正确。未来中国人民不会群起投入吴三桂式卖国活动，更无可能群起效法秦始皇，但很可能再度群起干毛式革命。

2、其所以如此，乃是两个基本原因决定的，首先是当初引发革命的那些社会黑暗仍然存在甚至更恶化了；其次是因为弱者奋起反抗强者永远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

3、不幸的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常常是草根民众奋起抗暴引出来的。在现代，暴力革命本来就是制造极权制度和大独裁者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点下文还要提到），只能使社会倒退，如果它是人民革命，则引起的灾难就更深重。可以说，暴力革命的人民性越浓厚，则引起的恶果也就越可怕，比较一下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民主革命”，立刻就能看出这经验规律：随着人民介入的程度增加，恶果也就越严重。

4、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

A、驱使革命者投身暴力革命的乃是仇恨，革命军相对于反革命军优势也完全来自于深仇大恨。因此，一场暴力革命想成功，领袖们非得使用这“精神原子弹”不可，这就是林总当年为何要在东北搞“两忆三查”。而仇恨乃是人性中保留下来的兽性。暴力革命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机会，使得在和平时期被压制的兽性获得空前解放。在文革中发生的群众暴行，和日军在二战中集体犯下的战争罪行，其发生机制有相通之处。兽性大规模释放出来，必然要给全社会造成巨大灾难。但因为这种兽性提高了战斗力，有助于革命成功，它不但不会受到革命领袖的谴责，还会被当成“革命彻底性”加以肯定和提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自幼受的革命传统教育，除了“对同志春天般温暖”那无法兑现的空话之外，有哪一条不是对兽性的公开表彰？

B、因为社会不公，草根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对文明世界隔膜，知识欠缺，视野狭窄，心态不很正常，不但对统治者充满嫉恨，也对文明和文化精英怀有嫉恨。当他们一旦因使用暴力获得了支配他人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权力之后，盲目破坏欲便会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爆发出来，造成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英的毁灭，从项羽烧毁阿房宫、李自成烧毁故宫，直到文革前拆除北京城墙以及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贯穿着一条醒目的红线。

C、人民革命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列宁发明的由革命党严格控制的军队式人民革命；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那种自发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极权国家，后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会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坏欲等兽性获得空前释放。

两种革命都会极大地败坏全民素质，苏式人民革命使得全民军事化，使活人异化为毫无自由意愿、自由人格的“齿轮和螺丝钉”（斯大林语）或曰“驯服工具”（刘少奇语），使得社会彻底丧失自由社会的建设基础。而自发人民革命如文革则会造成全民革命化。这革命化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土匪化，它使得全民获得了一种藐视一切权威、无法无天的土匪气质（亦即所谓“造反精神”），使得社会彻底丧失法治社会的建设基础。第二、政客化，它使得参与权力斗争的知青们统统变成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阴谋家，对此，我已经我在昨天贴出的《黑崽子》第十章里给出了亲身经历作为例证，使得原来质朴的工农大众变成了胡搅蛮缠的暴民。文革使得全民狡猾度出现飞跃性上升，就是这革命化的生动表现。这两者都阻碍了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

这就是群起抗暴的正义斗争何以一定会“走向反面”，不但要给全民带来巨大灾难，而且会制造出更黑暗、更不公的社会的发生机制。也就是我为何要在上网之初写下“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的字字血泪的警句。此乃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可惜在海内外中国人中，能观察到这现象者仍寥寥无几，从理论上指出其必然发生机制的就只芦一家，别无分店了。

但即使全体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又便如何？在专制社会中，人民并不能决定社会走向，只有统治者才有这能力。我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指出，在专制社会中，“君君”是重中之重，是社会健康度的决定性因素。这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社会是走向光明还是黑暗，决定权并不在人民而在统治集团手中。

不幸的是，中国统治者从来是见了棺材都不掉泪。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咱们都和英国人截然不同，因此，逃出“黑暗—革命—更黑暗”的永恒恶性循环的希望实在渺茫。

我曾在旧作中向大众介绍过英国革命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众所周知，毋庸置疑，英国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脑袋，把大独裁者克伦威尔扶上宝座，使得全民备受荼毒。此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牢牢地记住了那个血的教训。当社会危机尖锐、人民起来抗议之时，统治者怕官逼民反，再闹出一次大革命来，自己免不了要掉脑袋，而人民知道即使把国王推翻了，也只会扶上一个更结棍的独裁者去。于是双方都有所忌惮，不敢把事情做绝，吵得差不多了便达成妥协，从此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破坏，使得社会以零代价或小代价平滑进化到今天的高度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

可惜在咱们这儿，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总结经验教训都恰好和人家相反，乃是“只恨当初未能斩尽杀绝，留下祸根”。最能说明这点的，乃是文革的一个“成果”。

我在本文开头列举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一、把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这四项任务，他每一项都失败了。第一项：刘虽然给整死，但甚至在毛死前，官僚集团便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开始复辟，在毛死后则全面复辟；第二项：人民当家作主更是梦话一句，人民在“解放”后遭到最严重最普及的迫害正是发生在此期；第四项：文革确实培育出来了一代新人，可惜全是土匪加政客。对土匪脾气毛倒似乎没多少意见，但对“大私无公”、鼠目寸光的刁顽政客他却无法容忍。在接见五大领袖之后，他发现那些人全是敷不上墙的烂泥，大失所望之余，不但罢了“革命小将”们群众领袖的显职，而且为此把尚有可塑性的知青统统赶到农村去改造。直到开九大时，他的失望之情尚溢于言表，说什么原来想从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没想到这些人都靠不住，以后只能从工农里找，云云。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三项任务，亦即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来杜绝特权阶级产生，防止官员蜕化变质。不能不承认，毛终于看到了执政党有接受人民监督的必要。这构想与美国国父们规定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君的权利如出一辙，都属于毫无操作性的革命浪漫主义。两者的区别是，后者还没昏聩到居然梦想把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纳入以公民守法为操作基础的国家管理，这完全是用炼钢转炉炼制冰激凌，也只有毛那种制度建设白痴才想得出来，正如这世上只有他才会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来一样。

这倒不是最有意思之处，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官僚集团对此的反应。小帮菜们不知道，我党的大规模腐化其实发轫于毛时代晚期。文革前党风大体还可以，文革反倒启动了党的腐化，它的丰硕成果之一，便是制造出了一个空前放肆的特权阶级。

老帮菜们想来都该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不得不向官僚集团让步，被打倒老干部纷纷复辟。这些人总结的沉痛教训就是：失去权力乃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他们一上台就以十倍的贪婪、百倍的疯狂立党为私，第一件事就是大开走后门之风，把孩子从农村里弄回来，塞到大学和部队里去（当时当兵是最风光地位最高的职业），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搞裙带关系，生生把我党变成了个父子党、夫妻党、裙带党、关系党。自毛开始，所有党魁除了周恩来一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把老婆弄到台上去招摇，什么李先念夫人、朱德夫人、甚至连谢富治夫人，统统都成了党国大员，当真是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乌烟瘴气。

由此可见，党官僚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趁还在台上之时，死命地捞，活到老，捞到老，捞不饱，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捞酪。要打破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的党官思维定式，让官僚集团如同英国当年的贵族一样，知道厉害，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逐渐采取让步政策，纠正社会不公，避免革命再度爆发，我看根本就毫无希望。

另一方面，随着党内特权阶级在新时代蜕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伟大领袖留下的革命遗产必将在广大草根民众之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反响。只待时机一到，伟大领袖殷勤布下的遍地炸药，就要再度把中国崩到九霄云外去。

于此可以总结出中国社会旋转的“周期律”（被文盲黄炎培误为“周期率”）：

社会不公—革命—制造出大独裁者—制造出基于暴力压迫的长治久安的畸形社会，直到铁血强人死去—无法在和平环境中制造出大独裁者来，统治弱化伴随着社会疾病恶化—新革命—制造出新的大独裁者—制造出新的基于暴力压迫的长治久安的畸形社会来。

所以，在中国，文革其实是永远不死的，不但当年参加革命的压迫和被压迫阶级是永生的，号召并指引双方发生暴力冲突的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是永世长存的。伟大领袖不但能在生前毁党造党，在死后百年内照样能这么干。上下几千年，环顾太阳系，有此本事者，也就他一人而已。

不死的痞子阶级武化大革命万岁！

（全文完）

~~~~~

【拒绝遗忘】

徐星在德国放映《我的文革编年史》

• 王容芬 •

上周六（2009年5月2日）下午，徐星在法兰克福日用艺术博物馆放映《我的文革编年史》。观众大多是德国人，男女老少兼有。映后该馆亚洲部主任封·舒伦堡博士主持讨论，徐星回答观众问题。

问：您是一位知名作家，怎么想到拍电影？

答：拍电影也是一种写作，用镜头写作更直接。

问：您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答：那个时代是我的童年，我一生最重要的十年，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我要把这十年记录下来。

问：文革是一场倒退。您认为，文革把中国拉回多少年？是不是十年？

答：文革焚书坑儒，把中国拉回秦始皇时代，拉回了两千年。

问：文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毛为什么要把他的国家投入一场空前的混乱？

答：文革是共产党内斗争的产物，毛害怕失去权力，试图通过混乱制服对手。

问：文革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有关系吗？

答：我认为没有，因为文革反传统。如果非说有，那就是毛使用了传统文化中的权术，毛精通权术。

问：如何评价毛？

答：官方的评价是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

问：您的看法呢？比如与希特勒相比。

答：我认为毛比希特勒坏。

问：为什么文革中全中国的人都喊毛万岁？

答：人需要安全感，随大流安全。在文革中，口号喊得越响安全感越强。

问：可是西方也有人相信毛，比如德国的六八年人，就曾经想用毛思想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

答：那是些毛分子，文革中在中国的外国毛分子也造反，例如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他们的特权是毛给的，仰仗毛过着特殊生活。今天仍有这样的毛分子，比如拍《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卡玛，她的父亲韩丁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一个美国人加入了中共！他们的一切都是毛给的，抛弃了毛主义，这些人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他们坚持毛立场，试图回到文革，回到他们失去的天堂。

问：您拍了人们在韶山向毛像三鞠躬和合十膜拜的镜头，毛在这些人心目中是神吗？

答：是个小佛爷吧。

问：您如何看待今天中国一些人对毛的崇拜？是一种宗教崇拜吗？

答：我认为这种崇拜表达的是对现实和当局的不满，与宗教无关，或者很少有关系。

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呢？

答：在中国，人们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没有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西方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中国人现在还不可以。

问：西方有言论自由，可是说了未必管用，比如现在的经济危机，说了也白说。

答：西方有经济危机，但是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说他们想要说的，虽然说了不一定管用。中国人连说都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可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达想法。自由表达是很重要的需求，所以中国人第一步先要有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

问：中国人当前最需要的难道不是民主吗？

答：中国人行使民主，只会使用共产党的技术，到头来还是没有民主。我认为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表达的自由。

问：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您给心中的姑娘写了一封情书，写的却是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是您被抓了起来。您现在怎样想这事？

答：我很感谢这位姑娘，没有这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问：您这部电影可以在中国放映吗？

答：不能公开放映，只能私下里看看。

问：您的下一部电影准备拍什么题材？

答：关于告密的。

到了闭馆时间，观众热情不减，又到美茵河畔继续讨论。本周徐星将去海德堡继续放映《我的文革编年史》。20年前他曾在海德堡大学做博士论文，有许多故交。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